

2019 年第 4 期
(总第 254 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 & Social Sciences)

No. 4 2019
General Serial No. 254

媒介功能泛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发展

赵振祥¹, 王超然²

(1. 厦门理工学院 时尚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2.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随着媒体融合催生“平台媒体”的出现, 媒介功能亦迅速泛化、转型。媒体融合不仅融多种媒体于一体, 甚至打破新闻媒体与其他政府、行业等信息中心的界限, 建立起跨媒体, 乃至跨行业的融媒体中心, 并把新闻传播、舆情监测、政策宣达、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社区交互等多媒介功能和多种用途融于一体, 向各类机构组织和公众提供多功能服务, 担负起全方位资讯服务的“全媒体”角色。传统的新闻传播正迅速向资讯传播转变。因应这一趋势, 对融媒体产业链的全链条管理已经提上日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亦与资讯搜集、仓储、整理、分析、传播等各个环节全面对接。从新闻理论到新闻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正在变得丰富而生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亦初显形态, 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关键词: 融媒体; 资讯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9) 04-0123-08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说过:“人们很容易忘记媒介对交往关系的积极介入会达到何种程度。”^[1]从报刊到广播电视再到当下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产生的各类新型媒介, 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地推动着媒介功能的革新, 媒介对人类交往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与改变堪称天翻地覆, 而近年尤甚。新闻传播学科亦一脉而动, 在媒介技术和传播环境剧烈的变革中面临挑战, 从理念到技术层面都在不断调整。

一、媒介功能的泛化与“平台媒体”的崛起

“媒体”与“媒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媒体’与‘媒介’,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混同使用, 并未做明确的界分。而具体到媒体关系的研究上, 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分就显得很有必要。我们倾向把‘报社’定义为媒体, 把‘报纸’定义为‘媒介’; 把‘电台’‘电视台’定义为媒体, 把‘收音机’‘电视机’定义为‘媒介’。”^[2]从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技术, 从电子技术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媒介技术的进步一直推动和引领着媒介功能的变革, 也推动着媒体机构的变革。这种变革有时几乎是颠覆性的。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很多报纸从铅字印刷开始改为激光照排技术, 在一片“告别了铅与火, 迎来了光与电”的喝彩声中, 大批铅字排版工人和手工画版组版的编辑不得不下岗转岗, 取而代之的是, 掌握电脑排版和激光印刷技术的年轻人走上工作岗位。时至今日, 曾经占据新闻传播主阵地数百年的报纸已经纷纷让位给日新月异的新媒体, 电台、电视台亦不容乐观, 三大传统媒体都在巨变的媒体环境中疲于应对, 经受着生与灭的挑战。

收稿日期: 2019-01-20

作者简介: 赵振祥, 男, 内蒙古赤峰人, 厦门理工学院时尚学院教授,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 王超然, 男, 河南郑州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而观之,同传统的媒体环境相比,当下的媒体正在经历两大质变:

一是传统媒体向融媒体转变。关于融媒体的讨论,学界和业界多有论述,一个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所谓的融媒体就是媒体融合,就是把广播、电视、报纸以及新媒体等融为一体,实现资源共享,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提升传播效果。例如人民网滕力认为“融媒体突破了媒体间的界限,将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的传统广播、报纸、电视台、网站资源整合,实现媒体间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3]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东东在评价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时亦持此一说,认为县级“各融媒体中心整合原所属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新媒体等多个媒体平台,通过组织机构、生产流程、体制机制、人才资源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科学评价、有效应用’的全新生产流程和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4]

事实上,对融媒体的这些解读既偏执一端,亦未看到融媒体的实质,这种实质就是媒体角色的根本性转变。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融媒体”概念重新做一下诠释:融媒体不仅是指把多种媒体融于一体,同时也指的是把多种用途融于一体,让媒体肩负起多重角色。有学者把这种媒体称之为“平台媒体”(platisher):“平台媒体是指既拥有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又拥有面向用户平台所特有开放性的数字内容实体。”^[5]这一定义似乎有点理想化,因为从当下的有影响力的平台如“今日头条”等看,所谓专业编辑权威性虽未必做得到,但你不能否认它们是有影响力的平台媒体。亦有学者并不强调这一点,而简化概括这种“平台媒体”为“提供公共信息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交流、互动的平台”。^[6]当然,未来随着体制和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这些“平台媒体”也可能会逐步规范,逐渐增强专业权威性,这首先在政府主导开办的“平台媒体”上应该能够做得到。以国家正在推动建设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例,它们未来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应该不是问题。在功能上,过去县级媒体就是播报新闻的,现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就是要融合多种用途,让媒体中心担负起全方位角色,包括县域新闻报道、舆情搜集、工作布置、政策宣达、社区互动,甚至包括农资销售、防灾预警、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等信息的推送等,融多功能、多角色于一体,实际就是要建立一个县级的资讯传播交流中心。新闻媒体在功能上呈现出强烈的泛化趋势。

二是新闻传播向资讯传播转变。新闻媒体功能的泛化和向资讯平台的转变,是新闻媒体角色的一个质变。因应这一个质变,这就有了第二个质变,即新闻传播向资讯传播的转变。所谓资讯是指为用户所需要、能够给用户带来价值的信息。资讯传播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目的性和价值性的信息传播。资讯相对于信息而言主要有两大改变,一是把信息从无序变为有序;二是把信息从无用变为有用。而资讯对于新闻信息而言,亦同样具备这样两大改变:如果在一个地点发生一起车祸,那是新闻;如果这个地点连续发生多起车祸,并经过分析梳理有了明确的原因指向,那是资讯。

资讯传播与新闻传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从资讯传播角度来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具有价值的。资讯的生产和传播的全链条都具有明确的价值诉求,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而新闻传播则不同,虽然新闻媒体也刊发公关宣传、广告等具有明确目标诉求的信息,但毕竟受到限制,否则媒体只能关门大吉。更多的新闻信息只是天女散花式地为最广泛的公众提供一种信息消费——有时甚至连消费也谈不上,只是提供一种消遣。如果说这中间新闻媒体有价值诉求,也不过是希望最大程度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把这种注意力打包再卖给广告商,至于新闻类信息其本身的价值属性并不明显。

其次,新闻媒体对新闻的选择具有明确的要素限定,“新的事实、新的信息和普遍兴趣是构成新闻价值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乏其中一个,便不能形成新闻价值。”^[7]这里其实可以归为两大要件:一是新闻姓“新”,强调时新性,不具备这一要件的信息无法吸引记者。二是新闻要具有“普遍兴趣”,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报纸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发掘探索共同兴趣的过程,‘共同’的范围较大,报纸的销路就越广,如果尽是个别人关心的消息,只有个别人愿意看,就不能大量销售,也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只能关门。报纸就是依赖共同兴趣而生存的,这点不会

再有疑问了吧?”^[8]“新”和“普遍兴趣”这两者缺一不可,不同时具备这两大要件的信息就不会进入记者和新闻媒体的视野。从这一点来说,新闻媒体所生产的信息量是相对有限的。而资讯传播则不同,一是资讯传播并不强调时新性,它强调的是阶段性和相对完整性。资讯传播亦不强调“普遍兴趣”,而是强调区域性和方向性,哪怕是小众范围,只要是有用的资讯就会受到网罗,或得到传播。二是与新闻媒体对信息的无比“挑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讯传播则是来者不拒、无所不包,生活中任何具有方向性的信息,包括那些暂时无用但将来可能会有用的信息、局部无用但全局可能有用的信息都会受到青睐,并被尽收囊中。三是价值再生。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资讯传播,其最大特征就是数据的价值再生。数据在传播中积累,在积累中传播,随着量的累积数据会发生质的变化,在积累和传播过程中实现数据价值的飞跃性增值,这已是人们对资讯传播的共识。相比而言,新闻媒体传播的新闻类信息,其价值的再生性并不强。如果我们把一条媒体新闻称为新闻本体信息,而把该条新闻置于社交大数据中所衍生的信息称为新闻再生信息,那么对于新闻人和新闻媒体来说,他们在采访和传播这条新闻之时可能并不会太在乎新闻再生信息,他们更在乎的是新闻本体信息的传播能够激起多大的漩涡,产生多大的影响。

融媒体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或者说它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大数据的形成。这种数据上的聚合所产生的价值溢出效应会远远超出数据本身。数据链就是价值链,资讯的采访、搜集、制作、仓储、分类、分析、内部分发、外部推送、交互传播,每个环节都在产生着数据的价值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会强力推动新闻媒体向多用途媒体发展,推动新闻中心向资讯中心转型,推动新闻传播向资讯传播转变。

二、媒介功能的泛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实践

事实上,在媒介技术进步推动大众媒介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媒介的功能一直向外进行着拓展,有时这种拓展甚至是飞跃性、颠覆性的。这种拓展概而言之就是从新闻传播向资讯传播拓展。人们逐渐发现新闻媒介除了最初赋予的新闻传播功能,又具备了宣传功能、舆论引导和环境监测功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就首次提出大众传媒有三大功能——守望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9]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第四大功能即“提供娱乐”。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威尔伯·施拉姆则概而论之为三大功能,即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后来人们发现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还具有情报的功能,包括政治情报、科技情报、经济和商业情报、军事情报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就在中国北京东单栖凤楼23号设立末次研究所,通过搜集国内外50多种公开发行的中、英、日文报纸,广泛集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资料,编成《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以资侵华决策之用。“各种公开的新闻出版物本身就是重要的情报源而倍受情报人员的青睐。有情报专家声称:最公开的报刊往往隐蔽着最秘密的情报。世界上不少有名的情报研究机构,如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等,都是利用公开资料进行研究工作的。”^[10]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尤其是进入融媒体和大数据时代,随着算法的介入和数据价值的迅速上升,新闻传播迅速向资讯传播转变,媒介的功能进一步泛化。“由于算法的介入,如今新闻专业平台和资讯服务平台边界日益模糊,正朝向‘泛媒体化’发展。像网易新闻、今日头条等被称为‘超级平台媒体’,它们不仅推送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还根据用户的年龄、偏好、地域等因素推送诸如星座知识、美食、随笔软文等生活服务类信息。新闻的功能从呈现经过核查和筛选的事实性信息、为公共生活设置议程,蜕变为碎片化、弥散性、时时微更新的资讯分发生态系统。”^[11]媒介在功能泛化的同时,对社会的介入呈现全方位态势,整个新闻传播业态也正在发生着质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新闻媒介的多功能性并利用它们来推动工作,包括通过新闻媒介来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新闻媒介来检验政策,反映和引导舆论,做好咨询和参谋工作,等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所秉持的核心理念,也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即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并成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列宁就曾经明确提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原理。^[12]新闻媒体应该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但它不是独立于党和政府之外的“第四权力”,新闻记者也不应像西方倡导的“客观报道”那样不干预生活,新闻记者“不是生活的消极旁观者,他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而且是斗争的参加者。不仅用发表报道参加斗争,而且就在采访过程中,也应以主人翁的身份适当地参加斗争。应该说,这应是社会主义国家记者的特点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要求记者到第一线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13]早在1989年,习近平同志对此亦有过明确的论述“我们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通过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反映人民的呼声,弘扬正气,揭露消极腐败现象,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闻工作者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认识新闻的作用,要看到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14]这一定位,正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沿着这一定位,因应媒体融合和媒介功能的泛化趋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and 实践层面上也在迅速跟进调整,并呈现出明显的新时代阶段性发展特征。从早期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强调转向新闻舆论工作,从立足三大传统媒体到近年来对新媒体、融媒体的高度重视,以及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对全媒体概念的强调,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方向的清晰把握。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15]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放大一体化效能,不但要整合各种媒介资源,也要整合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建设平台媒体以“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16]事实上,如果把媒介的一体化视为“体”,那么媒介功能的泛化就是媒介之“用”,正是媒介的一体化助推媒介功能的泛化,助推新闻传播向资讯传播迅速转向,二者“体”“用”结合,前因后续,不可分割。倾力打造平台媒体,通过媒介的一体化来融合多类型媒体,并泛化和创新平台媒体的多种功能用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助力,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方向和特色。

这种“体”“用”结合已经在我国融媒体建设中开始了全面实践。在过去铅字排版印刷年代,新闻传播业务主要分为编采、排版印刷、发行和广告四大部分,其中编采业务属核心业务,广告次之,排版印刷和发行属辅助性业务。而进入融媒体和资讯传播时代,从资讯的采访搜集到资讯的制作和分类仓储,再到数据的分析分发、推送使用和交互传播,每个环节都被充分强调和赋予价值,过去一些辅助性岗位甚至成长为核心岗位,一些边际工作成为中心工作。例如过去媒体设置的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基本是安排一些临近退休的老同志,处理一些群众来信,业务不多,压力不大。而在当下的融媒体中心,群众工作部则被推向前台,成为极其重要的部门岗位。以长沙红网为例,该网站于2017年上半年成立了专门的网上群众工作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红网《百姓呼声》《问政湖南》等湖南网络问政主平台、主阵地的建设和发展;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推动各级党政部门及时调查、回应网民诉求;研究、分析网民诉求动态,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等等。部门将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进一步发挥媒体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把媒体的引导、监督、服务功能与党的群众工作有机地合二为一,‘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17]从这一定位上就可看出群众工作部在红网的核心地位,也可以看出这一过去编辑部的边缘部门正在被赋予诸多新的职能,不仅包括传统的新闻媒体既有职能,还兼行网络问政和服务等一些党委和政府职

能,以及舆情搜集分析和舆论引导等其他相关职能。这其中很多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新闻传播职业范畴,甚至向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乃至国家治理等行业领域延伸。

这种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其实,近年来国内各大新闻传播院系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开始了调整,这一点可以从随着新媒体的崛起而渐趋兴盛的媒体关系角度获得明确的观察。“媒体关系(media relations)是指社会组织为营造和维护良好的社会形象,尊重新闻媒体的运营规律,主动与新闻媒体开展交流互动,以期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报道的行为。”^[18]媒体关系是在资讯传播环境下泛生出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呼应资讯传播理念,借重资讯传播的工具和方法,如舆情监测、资讯分析与资讯服务等,为企业、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等提供相关产品服务。由于这些组织都有正确处理媒体关系,并通过处理好媒体关系进而处理好公共关系的诉求,因此近些年来媒体关系的课程需求旺盛,不但在国内的新闻传播院系开始大量开设,而且走出新闻传播院系,向管理学院和公共事务学院延伸,面向政府和公共事务组织、行业企业开展大量培训。课程设计亦多围绕舆情监测、舆论引导、危机管理、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介运用,以及更具延展性的科学传播等相关领域展开,而这与传统的新闻业务“采、写、编、评、摄”相比显然是大大地拓展了。另一方面,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也发生了明显改变,以新闻专业为例,“大批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大概只有20%—30%去了新闻媒体工作。一些媒体的老总也不无得意地称不愿招聘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媒体,他们宁愿要一些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去从事日益专业化的新闻报道工作。但是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年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似乎并未显现出有多困难,很多学生都找到了相当不错的工作,那么,这些学生都去了哪里?我们调研的结果,是发现这些学生都去了媒体的‘对立面’——到行政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宣传等媒体关系工作了。”^[19]事实上,这些进入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学生大多工作于该单位新闻中心或信息中心,或依托外部“平台媒体”开展资讯传播工作来服务于本单位,这些“中心”已不是传统的报社或电台电视台,从事的工作亦远不是传统的新闻宣传工作,而是包括了资讯搜集、舆情研判、舆论引导、危机管理、政策推送、公共事务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工作。从业界到学界,从实践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科架构和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与方向正在初步形成。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背景下的资讯传播人才培养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20]针对媒体融合的发展现状,针对媒介功能的泛化和新闻传播职业的泛化,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转型升级要求。

从传统媒体进入到融媒体时代,从新闻传播进入到资讯传播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的转型培养涉及很多方面,但最核心的应该是基于资讯传播的特点,顺应资讯传播的需求,由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向资讯传播人才培养大踏步转型。而这一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工作是资讯素养教育。美国ACRL的《高等教育资讯素养能力标准》(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提出评估大学生资讯素养的标准,认为一位有资讯素养的大学生应:(1)知道资讯需要的范围;(2)有效地取用需要的资讯;(3)批判性评鉴资讯与资讯资源;(4)知道整合资讯到自己的知识库;(5)有效应用资讯来实践各项任务。^[21]香港中文大学资讯科技教育促进中心李芳乐教授亦对大学生的资讯素养给出评判标准:“第一,掌握必须的技能和知识以处理信息,例如:理解、寻

找、分析、评价与整合信息;应用处理信息的技能和知识;做出适当的决定及解决问题。第二,具备反思、处理信息的习惯。学生要懂得在急速变化而信息丰富的环境中规划、反思及调控其研究过程。第三,认识自学能力对个人成长、生活娱乐及终身学习的贡献。第四,在个人及与他人合作使用信息时有更大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22]借鉴这些评判标准,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我国新时代资讯传播人才的资讯素养教育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资讯传播理念的教育。从新闻人的角度来说,因为新闻姓“新”,采访人物事件首先强调的是“时新性”,所以过去我们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就像培养采茶人,总是教他们去采摘最新鲜的茶尖,全力去采访、去抓取最时新的信息。新闻记者对一般性信息并不感兴趣。进入到资讯传播时代,我们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要教育学生去认知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强化数据的价值意识,要在基础数据的采访搜集、收储积累、分类分析、多功能应用上下功夫。这不仅是个技术层面问题,更是个观念层面上的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未来的新闻工作者角色必然会泛化成为资讯工作者,或者说应该首先是一位资讯工作者。其次要强化整合传播、一体化传播的教育,而不是像传统媒体记者那样更多靠单打独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23]。这种一体化、融合化、流程化、协作化,乃是资讯传播时代大众传媒的共性化发展趋势。

二是强化调查研究观念的教育和调查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性”和“显著性”是传统记者选择采访报道新闻的重要标准。而一些“会议新闻”和“领导新闻”往往最符合这两个标准,因此一些记者就养成了“浮在上面”的习惯,乐于跟着领导跑会议,成了“会议记者”,媒体也被“会议新闻”所充斥。早在1989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地区工作时就批评过这种现象:“从我们地区的情况看,目前有部分新闻工作者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坐在办公室里想点子,靠简报、会议材料编稿子,有时下乡了,也是‘走马观花’。现在在报上看到的有关报道,内容深刻、质量高的报道还不很多;特别是有很多好的题材报道不出去,这和深入实际不够有很大关系。”他当时就强调记者“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深入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的工作作风。报道写得好不好,与新闻工作者能不能深入实际,深入采访很有关系”,并指出“调查研究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是新闻工作者成才的根本途径,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使自己锻炼成思想端正、作风扎实的新闻工作者。”^[24]为了改变这种现状,2003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中提出“三贴近”原则,即记者和新闻媒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011年中宣部、中央外宣办等五部门再进一步部署各媒体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简称“走转改”,目的都是要改变记者“浮在上面”的工作作风。

进入资讯传播时代,新闻工作者更需要强化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事实上,进入到资讯传播时代,新闻工作者可能需要防止的不仅是“浮在上面”的作风,更要防止“浮在数据”中的工作作风。做数据工作久了,就很容易养成从数据到数据的工作习惯,形成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靠简报、会议材料编稿子”的状况。而且随着各类社会组织拥有的数据呈几何数量的增加和算法的成熟,新闻工作可能会比过去变得更加“容易”——记者们可以很轻松地把需要的数据一网打尽,甚至可以交给机器去生成文本,久而久之,很多新闻工作者可能就会成为“浮在数据”中的一族,变得越来越脱离实际。因此,多渠道搜集数据、辩证地看待数据、合理地使用数据,尤其是重视数据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的结合等,都需要在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中得到强调。

三是强化资讯传播的伦理教育。这是一个为新闻传播界日益重视并使其忧心忡忡的话题。各类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等等,他们生产、搜集、仓储、控制资讯的能力空前增强,资讯的机构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在资讯传播的链条上他们也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互联网正在从过去的自由化、去中心化重新走向板结化、中心化。而大量的新闻传播人才从业其中,他们就必须面对服务本单位还是服务社会的问题。这两者有时是孰前孰后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尖锐冲

突。在资讯传播时代,我们需要教育学生,告诉他们在为本单位服务的同时,更需要为社会服务。他们应该站位更高、境界更高一些,更好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如果他为了自己所在单位利益可以不择手段,那当然不是我们培养的目标。

资讯传播时代的伦理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例如用户隐私泄露并被恶意使用的问题已变得异常严峻。2018年4月10日至11日,Facebook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美国国会就“剑桥分析丑闻”和有关其公司数据收集惯例接受质询,他承认:“我们在防止这些工具被滥用和产生伤害等方面仍做得不够。有人利用Facebook平台散布虚假消息、国外一些机构利用我们的平台干预选举事务,此外,还有人在Facebook平台上发布仇视言论,另外还涉及到开发者和数据隐私的问题。”^[25]

另外,基于算法的资讯推送也饱受诟病。每个用户的每一次浏览选择、每一次购买或其他消费行为,都会被记录并被视为偏好性选择,然后就是无休止的个性化推送,“让你一次看个够”,让人感觉说不出是被充分服务了还是被困住了。这种充分的资讯喂饲实际意味着另一种剥夺,它严重窄化着用户的信息世界,也窄化着用户的认知。它带来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算法给每个人都定制了一份特殊的动态算法模式,一方面算法基于用户阅读习惯和内容进行推荐,另一方面用户每一次浏览又被算法所记录,并且直接影响下一次推荐,这样整个‘私人定制模式’是一套加固循环模式。长此以往会造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受众仅仅安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圈子里,具有排他性、固执性。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少,对于社会‘公共意见’越来越麻木。”而“人文主义终极目标是要关注将个体维系起来的社会纽带,也是涂尔干所说的具有道德特性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26]大众传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最大程度沟通社会共通的价值观念,扩大共同的公共空间,以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共同进步。而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亦是要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关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防止他们在资讯传播中扛着“以人为本”的幌子而离人文主义渐行渐远。除此以外,传播伦理与传播安全如资讯泄密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也密切相关,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提出“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27]此外,融媒体平台和资讯传播带来的其他问题,如网络诚信、网络侵权、群体极化和舆论极化等等亦是亟待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从当下的发展趋势看,如何处理好信息的自由获取和国家安全风险的关系、增强社会网络和参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享受技术便利与加强隐私保护的关系、促进网络社交与重建网络信任的关系,是全球平台媒体发展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28]这些挑战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人才向资讯传播人才转型培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注释:

[1]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2][18][19] 赵振祥等《媒体关系管理——理论与实战》,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第4页,第4页,前言。

[3] 滕力《融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作品版权保护》,《中国版权》2018年第5期。

[4] 李东东《加快融合发展 推动传媒业的变革与进步》,《传媒》2018年第23期。

[5] 喻国明、焦建、张鑫《“平台型媒体”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6] 宋建武《未来媒体将是平台型媒体》,《光明日报》2016年11月5日。

[7] 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8] 王中《论共同兴趣》,《文汇报通讯》1980年第9期。

[9] 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中的结构与功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10] 赵振祥、李明合《传播与保密——情报新闻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3页。

[11] 孙海龙《新闻算法推荐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基于人文主义视角》,《新闻世界》2019年第1期。

- [12]列宁《从何着手》,《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8页。
- [13]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 [14][24]许一鸣《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谈新闻工作》,《中国记者》1989年第7期。
- [15][16][23][27]《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2019年1月25日,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 2019年1月25日。
- [17]肖雄、张易《全国媒体第一个网上群众工作部在红网成立》,红网: <http://hn.rednet.cn/c/2017/05/18/4297962.htm> 2017年5月18日。
-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 [21]转引自王梅玲《大学生如何培养资讯素养能力以提升竞争实力》,《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5期。
- [22]李芳乐《21世纪学习与资讯素养》,《信息技术教育》2006年第8期。
- [25]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数据门”听证会上的证词》,搜狐网: http://www.sohu.com/a/227977097_297710, 2018年4月11日。
- [26]孙海龙《新闻算法推荐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基于人文主义视角》,《新闻世界》2019年第1期。
- [28]张志安、姚尧《平台媒体的类型、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廖哲平]

Generalization of Media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O Zhen-xiang¹, WANG Chao-ran²

(1. School of Fash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Fujian;

2.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As “platform media” has emerged with media convergence, media functions have been rapidly generalized and transformed. Media convergence not only integrates multiple media, but also breaks dow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news media and information center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Media convergence establishes a cross-media and cross-industry convergent media center, and integrates multiple media functions and multiple purposes, such as news dissemination,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policy advocacy,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public services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 This converged media center provides multi-functional services for all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 public, and assumes the role of “all-media” in the provision of all-round information servic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raditional news communication is rapidly shifting to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ith this trend, the chain management of the media industry has been put on the agenda, and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is fully integrated with information gathering, warehousing, collation, analysis and dissemination. From news theory to journalistic practice, socialist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ecoming enriched and vivid. Socialist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taken shape and is thriving as well.

Keywords: convergence media,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ocialist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